

# 北洋政府就俄国溃兵难民入华的危机应对 (1918—1924)

许梦阳

**内容提要** 因十月革命的爆发,大量白俄溃军与难民逃入中国并形成危机。新疆最早发生溃兵难民涌入,在杨增新为首的当局与各族人民努力之下,将大部溃兵难民遣返安置,并维护边贸。东北各省保护溃兵难民,斥巨资提供免费交通食宿,还承担国内各地俄国难民的汇集转运。当局与租界使团在上海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募捐救助难民,并成功化解多次俄舰入沪危机。尽管北洋政府当时处于困境,仍旧严守中立,以人道主义为本承担数十万难民救助任务,并积极与国联合作履行国际责任,可谓功不可没。

**关键词** 十月革命 俄国溃兵难民 北洋政府 租界使团

许梦阳,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210097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8.01.032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沙皇俄国在战争与灾荒双重冲击下诸多矛盾激化,最终爆发革命。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后肃清白俄与外国干涉势力,此间大量白军溃兵、难民逃亡西欧或远东。中俄两国有漫长国境线交集,溃兵与难民蜂拥而来,或从新疆、东北入境或由海路逃往津、沪。中国在一战时期相对稳定,北洋政府虽面临困境,却愿意在国际事务上积极承担责任义务,力促一战之后的格局重建与区域安全,在俄国内战期间中国严守中立,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接受安置俄国溃兵难民,积极与国联合作解决难民救助与遣返问题。从1916年俄属中亚兵民窜扰新疆至1922年远东白俄政权的崩溃,数十万溃兵难民进入中国,北洋政府无私的救助功德无量。当前学界针对白俄溃兵难民危机问题的研究成果已有若干<sup>[1]</sup>,但主要从十月革命前的难民窜扰新疆以及上海白俄历史问题与国联参与救济难民问题等

[1]当前相关俄国溃兵难民问题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黄建华、马文华:《杨增新与俄国难民窜扰新疆事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汪之成:《旧上海的俄国侨民》,〔上海〕《社会科学》1994年第7期;黄建华、马文华:《俄国难民窜扰新疆始末》,《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王国杰:《20世纪初期远东地区的俄国移民问题》,〔长春〕《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加尔肯·哈力汗:《试论民国时期俄属中亚难民迁入新疆事件》,〔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5期;丁强:《国际联盟与俄国难民的遣返尝试》,〔哈尔滨〕《西伯利亚研究》2010年第3期;白运增:《杨增新与白俄残兵窜扰新疆》,〔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硕士论文,2011年5月;王继舜:《中国参与国际联盟救济白俄难民之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硕士论文,2011年7月;郝建英:《杨增新时期新疆与苏(俄)在引渡和经贸问题上的交涉》,〔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2期;蒋杰:《难民与都市:上海白俄难民危机的兴起于

角度切入,从北洋政府对于溃兵难民危机应对的研究略显不足,且难民具体人数与分布并未明晰。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于北洋政府大量外交内政档案的梳理与分析,结合中外报刊新闻史料,望能够将白俄溃兵难民入华这一问题厘清。

## 一、俄国溃兵难民阑入新疆的应对

1916年新疆最先受到俄国中亚各族兵匪武装的袭扰,“俄、哈难民逃入边境,经地方官分置酌给衣食得免冻馁,约计有二十余万人……难民往往勾结生事,边围为之不宁,如是数年几经筹划,得遣令回俄”<sup>[1]</sup>。1916年至1917年间的俄民窜扰新疆问题学界研究已有相关成果,在此不予赘述。本节将针对十月革命后的俄溃兵难民涌入新疆问题进行述论。

十月革命后,红军对白军发动猛烈进攻,当时国内称之为“新党旧党”之争,布尔什维克节节胜利,俄国旧势力纷纷从俄境七河省进入新疆以躲避红军的追缴。1918年6月5日,伊犁镇守使杨飞霞致电新疆督军杨增新称:“逃来中国境内俄国兵民约数万人口,大车三千余辆,难民哭声震天惨不忍闻,后来者仍络绎不绝。广义党追击甚烈……边界拥挤不堪,乞速加派队伍前来防范。”<sup>[2]</sup>杨增新认为这次由于俄国新旧两党开衅,败兵与难民涌入,毕竟为逃难而来不应引起军事对峙。同日,俄旧党数千难民及800多车辆为躲避新党追截逃向我国霍尔果斯地区,被中国军队阻拦。俄旧党使节要求中方开放边界放行难民,无论中国军队如何劝阻,难民皆不肯返回。北洋政府下令:“俄境既有战事,此等难民如未携带军械,确系为逃难而来者,势难立时驱回,自应暂准住留,一俟俄境稍平再行劝其回国。至带军械之逃兵,应由中国派队住卡切实阻止,不准入境。如有绕越卡暗行入境者,应令解卸武装,由地方官指定地点暂为居住,仍俟俄境稍平体察情形令其回国。”<sup>[3]</sup>

俄旧党驻华公使库达摄福(N. A. Koudacheff)与驻俄公使陆徵祥会晤提出:“俄民逃入贵国新疆者甚众,现在异常猖獗,伊犁原有兵队未足抵御,应请增加兵力保护俄民。”<sup>[4]</sup>北洋政府命杨增新权宜处理,杨复电称:“悉俄民逃霍,暂准住留,带械逃兵派队查阻或令解除武装,指地暂住办理甚是。惟俄乱正极,伊、塔各属仍希严饬所在军队加意防范妥筹因应,以固边圉。”<sup>[5]</sup>当时由俄七河省避入新疆伊犁的逃兵难民共计8万余人,形状惨烈<sup>[6]</sup>。杨增新为避免溃兵生事以及红军追击,一面要求中国军队严格收缴俄兵武器,以免再生重大事端,一面迅速要求对难民进行妥善安置。

布尔什维克在阿拉木图建立革命政权后,允许逃亡中国的难民回俄,“惟索将倡首逃跑之头目交出”<sup>[7]</sup>。

处置》,〔上海〕《都市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曾少聪、李善龙:《民国时期新疆俄署中亚难民的安置和遣返》,〔昆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17年第5期,等。

[1]《中国历年处置俄败兵难民情形》,1924年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3-001。

[2]《对待俄败兵难民并毋庸添兵由》,1918年6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107-02-034。

[3]《对待俄败兵难民事》,1918年6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107-02-035。

[4]《商请保护逃入新疆俄民事》,1918年6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107-02-040。

[5]《俄难民逃兵事》,1918年6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107-02-041。

[6]《杨增新电》,《新闻报》1918年6月9日,第2版。

[7]《请拒阻激党入伊并保护俄难民事》,1918年6月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107-02-056。

由于追击白军心切,红军进入新疆伊犁向俄商征税以保证革命军费。俄旧党要求中方出兵保护俄商安全,杨增新认为此事极其复杂并涉及别国内政,对于新旧各党不可有所偏袒,但红军“借索税名义拦入中境,难保不妨害我国治安”<sup>[1]</sup>,因此要求中国军队阻止红军进入中境以防止地方糜烂。杨还严词拒绝旧党提出的取道中国伏击红军的要求,认为“旧党闹事,伊犁将成战场”<sup>[2]</sup>，“于中于俄两有不利,万难许允”<sup>[3]</sup>。杨增新也力拒布尔什维克在新疆境内铺设公路的要求<sup>[4]</sup>,以不偏不倚态度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定。

1919年以后,逃亡伊犁的旧党分子又复蠢动,频频武装骚扰新疆并欲跨境袭击布尔什维克政权,红军陈兵千余人于沃木斯克欲进剿旧党,致使恰克图后营子地区集结俄难民数万人<sup>[5]</sup>,杨增新即命部署做好应战准备,声明将保护难民与国人免遭兵祸,并驻兵新旧两党的中间地带为缓冲,要求各方严守国际公法,公平合法解决这一问题<sup>[6]</sup>,坚决制止武力冲突以防事件升级。

杨增新主张对于俄两党交涉以维护中国主权为宗旨,“不必与俄使与沃木斯克政府交涉”<sup>[7]</sup>。北洋政府亦决议对侵入我边境的俄国武装视为敌人,“飭外蒙、新疆边吏于其侵入我境时准以武力驱逐”<sup>[8]</sup>。1920年,新疆当局严令俄国势力撤离,“乌拉和曲地方逃驻俄哈勒限三日一律出境……毋稍放松以免逗留”<sup>[9]</sup>,并令蒙古王公勿将牧场租予越境俄人。针对塔城等地逃难俄商要求进入省城者,新疆当局谕令:“照旧在塔安住,不必迁移……如有俄商逃来切实阻止,仍令回塔。”<sup>[10]</sup>1920年10月,当局侦知俄国旧党势力妄图将俄人聚集以制造事端而果断行动,“因俄旧党败兵来省甚多图谋暴动,业已宣布戒严令,凡在新疆旅居之外国人,非经发有免許状者,不得任便出城入城。”<sup>[11]</sup>同时杨增新也致电红军将领,声明中方的中立态度,其文如下:

贵国与中国邦交素笃,此次贵党与旧党战争系属贵国内战,勿论谁胜谁败,我国遵照公法严守中立,抱定不干涉主义当为贵党所深信。现在贵党军队追击旧党败兵与我国国境相距太近,我国遣派军队扼守国境沿边各卡,不令旧党军队侵入。无奈战地与中境紧接,致旧党败兵竟有逃入我境求生之事。我国本不乐于收容,为遵照公法与尊崇人道起见,于事实上复有不能阻其入境之势。现我国对于逃入中境之旧党败兵除依照公法令其解卸武装由我国指定地点安置,一面派兵妥为监视……请贵统兵官亦遵照公法与人道主义,飭令部下军队对于旧党因战败逃入我境逃命之兵,不得越境追击以敦中俄睦谊实为至幸。<sup>[12]</sup>

[1]《俄广义派有侵入伊犁界内向俄商索税消息驻伊俄领请求保护事与中国治安有关已飭所属严为防范由》,1918年6月22日,档案号:03-32-107-02-057。

[2]《新疆督军杨增新电》,《新闻报》1918年12月16日,第2版。

[3]杨增新:《电呈俄旧党军队取道伊犁进攻新党文》,《补过斋文牍》癸集一,[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024页。

[4]《新疆督军杨增新电》,《新闻报》1918年11月25日,第2版。

[5]《恰克图电》,《新闻报》1919年8月27日,第4版。

[6]“Russian Activities in Singkiang”, *North-China Daily News*, July 28, 1919, p.7.

[7]《外交部电》,《新闻报》1919年9月14日,第3版。

[8]《通信社电》,《新闻报》1919年9月20日,第3版。

[9]杨增新:《电复汪道尹报告勒令俄哈出境情形文》,《补过斋文牍》癸集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100页。

[10]杨增新:《电塔城文武暨乌苏游击劝阻俄商勿得逃来省城文》,《补过斋文牍》癸集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103页。

[11]《交通部收新疆杨省长电》,《交通部公报》第48期,1920年12月1日,第23页。

[12]杨增新:《代拟塔城张道尹电致俄新党统兵官文》,《补过斋文牍》癸集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版,第3121页。

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新疆当局交涉提出遣回难民、架设中俄电线等要求,杨增新认为遣回难民是解决危机的宗旨,但前提是真正平息中俄边境混乱局势。另外两党均希望在伊宁等地架设电线,杨派兵监视双方不得任意架设电线发电,杨认为:“所以只允在俄属边界设立俄线与我国霍尔果斯电线衔接者,实为藉以收回我国先前丧失之权利。惟我国由伊至霍电杆电线并未设立,应请由部拨款迅速办理,不宜惜此小费贻误大局,抑或酌给俄人经费,将俄人由伊至霍已设之电杆收归国有,以资挽救实业边防大有裨益。”<sup>[1]</sup>杨认为在华俄商只要平等纳税便不必引渡,并由旧党领事各派商务员分驻塔城及斜米解卸军装诸条件以维护安定。北洋政府认为杨增新此举均确当,“惟事关国际交涉,俄国现在虽无正式政府,我与订约总以不背国际惯例为是”<sup>[2]</sup>,可见当局谨慎之态度。

1920年后又有逃往新疆的俄溃兵难民近4万人,以阿年阔夫与及巴奇赤两股人数最多,其余残部数百人或数十人不等,安置于伊宁、塔城等处。由于游牧地方无房屋冬季严寒,特准自筑土屋材料,地租概不收价,带来马匹为之烙印,官方代收或任其自行变卖。能工作者送往孚远县铁矿做工月给工银,如娴习各项技艺,则由实业厅代谋职业,其余暂由官厅给予衣食日用诸品。溃兵难民的安置费用所耗甚巨,“阿年阔夫部下而论,于一百八十日内,已用米面十六万八千余斤,柴草二百九十九万九千四百余斤”<sup>[3]</sup>。虽有中国当局的善待,阿年阔夫及部署却意欲在古城引发暴乱,新疆当局设计劝降将暴乱化解,少数顽固分子被中国军队击溃。

至1920年9月,据交涉局调查逃民回俄者已达10420人,寓伊犁之俄旧党败兵内尚有都托夫部下1000余人,屡经劝导不肯回俄。阿连阔夫部署败兵除回俄者不计外,尚有官兵共计700余人,均被解卸武装。“除俄官等畏俄新党之仇视,抵死不肯回国,现已派兵护送来省,拟暂行安置哈密,将来或令取道外蒙或取道陕甘回国”<sup>[4]</sup>。1922年后,新疆局面初定,数十万难民大部回国,剩余难民溃兵后均由甘陕等地再经东北投向俄海参崴临时政府,再有难民涌入亦为数不众。

## 二、东北地区对溃兵难民的应对

东三省与新疆相似,向来为俄人聚集之地,十月革命后即有溃兵难民流亡进入,中东路为俄方控制,难民与溃兵多在铁路沿线聚集。1919年春,新旧两党激战,致使东北边境动荡,东北当局电告国务院称:“伊万诺夫屯激党万余人,筱晚与旧党及日军剧战,双方伤亡六七十人。又闻激党胜利,日军伤亡百余,阵亡崛大队长一员,难民愈激愈众,阿省可危。”<sup>[5]</sup>北洋政府鉴于此次危机作出决定,“黑河逼近俄岸,如难民来黑如何应付,乞示机宜等情。查俄民逃来避难,恐夹有激党,致俄旧党及日军等藉端搜索,转与主权边境有妨”<sup>[6]</sup>。

[1]《俄党要求四事现正交涉惟接修及引渡难民关系重要先行电陈由》,1920年3月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18-037-02-006。

[2]《新督与俄新党商订宽待逃兵难民等条件是否合于国际惯例请详核复由》,1920年5月2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18-037-02-016。

[3]《中国历年处置俄败兵难民情形》,1924年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3-001。

[4]《救助俄败兵难民事》,1920年9月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123-02-021。

[5]《黑河阻止难民入境由》,1919年2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039-01-050。

[6]《黑河阻止难民入境事》,1919年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041-03-010。

早在1918年,陆军部就向黑龙江省下令:“请贵省尽力对待,并由本部电知奉、吉两省酌量派兵协防,凡在境内,无论新旧党皆不得开展及扰乱情事,设有此种情形,应尽力禁止。败兵入境时应令缴械,方许入境。”<sup>[1]</sup>至1919年底,白俄军队节节败退,临时政府东迁至伊尔古斯克,其送入中东路的伤兵达到25000余人,中方担忧大批败兵难民入境恐有阴谋<sup>[2]</sup>,“中央迅行电海参崴、伊尔古斯科驻在华官,密侦俄情并探寻协商各国对俄意见”<sup>[3]</sup>。

虽然当局阻止溃兵难民入境,但其仍旧沿中东路源源而来,并与中国军队发生摩擦。1920年初,白军炮击华舰,引发外交争端,中方本欲终止对俄旧党控制区域的粮食输出以示惩戒,东北当局声称东北岁收仅有7成,且俄国难民大批入境恐难维持,计划禁止粮食出口俄国<sup>[4]</sup>。在外交部特派驻西伯利亚高等委员李家鳌等人的斡旋之下,以人道主义为本,救助难民为先,中方同意继续向俄方出口粮食。

1921年,国联要求中方调查东北、新疆等处俄国败兵难民情况。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回电:“俄侨在奉省者为数无多,惟吉、江两省边境及哈尔滨等处俄侨不少,但能服从我国法律,自当听其居住。此外如何应付应厅中央主持办理。”<sup>[5]</sup>奉天仅有俄侨70余人,并无难民涌入,“间有由南省回国之难民经过奉省时,即由特派员给资遣赴长春,其款在特派员署经费内开支”<sup>[6]</sup>。相比之下黑龙江、吉林两省俄国难民问题严重,黑龙江督军呈报难民情形如下:

黑河道区侨居俄人共四百零二丁口,海满境内共有俄难民男女大小一万三千四百五十八丁口,各难民除少数佣工于人外,多以畜牧为生活。暂时安置办法即准其领有住居执照侨寓于此。然佣工者得所无几,畜牧者亦非长计为谋。善后须策将来是以正在参订章程拟请准其入籍从事开垦庶,在我可收实边之效,在彼可免冻馁之忧。昂昂溪车站有俄难民五户,计男女二十五丁口各等情先后俱报到署。查国际联合会提议安置俄国难民,果能将俄国难民安置,系一种人道主义。无如我国沿边近邻,俄境与他国及腹地不同,其侨寓我岸者多半旧党,与谢氏有密切关系,倘列入国际联合会为之安置,是直为旧党组一团体机关,凡不赞成俄现政府者,势必源源而来。无论远东政府出而抗议,无词答复,万一第三国利用而施以阴谋,则库伦崑崙之变将复演于我国沿边,其患何可胜言。<sup>[7]</sup>

至1922年11月,白党败退由绥芬、琿春各地逃入吉林境内,共计10000余人,中间难民与妇孺居其多数,中方按国际法原则不予以坚决驱逐,对军官及士兵则解除武装,严行监视,对难民及妇孺则分别安置予以给养。已经解除之武装,按数编号妥为存放。即官兵难民私人之资财物品,均点清封存。吉林督军孙烈臣认为:“俄方委员固不谅解我方处置供应之完美,仍复表示不满,非出于误会即系别有

[1]《附二:抄参陆部复黑龙江督军电》,《中俄关系史料——东北边防(1917-191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版,第90页。

[2]《鲍督沁电陈俄伤兵难民入境事请核示见复》,1919年12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27-03-012。

[3]《鲍督沁电陈俄伤兵难民入境事》,1919年12月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27-03-013。

[4]《海参崴李高等委员电》,1920年1月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304-01-004。

[5]《处置俄侨事》,1921年7月19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03。

[6]《俄人在奉情形》,1921年10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24。

[7]《关于电查俄侨状况事报告各处查复详情附陈意见请鉴察》,1921年10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27。

用心,特借此为寻衅之地,亟遣送出境一节在我岂不愿照此办理。绥芬站收容之俄党先交由满洲里遣送,共三批计一千数百人,其他党人……抵死不肯出境。暂时只有择地安置之一法。”<sup>[1]</sup>

1923年,东北地区绥芬、满洲里、延吉、长春以及呼伦贝尔各地,无处不有俄难民踪迹,哈尔滨、中东路一带人数尤多。东北当局采取行动派兵驻守沿边防制两党军事行动,并将逃兵解除武装暂为安顿给予衣食,或酌量资遣回国,其有能自谋生计及报觅亲友者,由地方官发给执照准其居留。“黑龙江于省城设立收容所瞻养俄人,凡饮食衣履日用器物供给周备。办理一年共用金卢布九万八千五百八十元,华币大洋二万九千余元。而民国九、十两年自满洲里运入大批俄人,送往绥芬出境者约及三万左右,需费尤为浩大”<sup>[2]</sup>。

鉴于哈尔滨地区难民人数过多,1922年3月当局于吉林省境内开设工厂,招徕难民为工给予薪资,以分流黑龙江省的压力。另由延吉入境的6000余难民被分别安置于长春、农安、榆树等处。1922年冬,海参崴政府失败,俄人逃入者愈多,当局与苏维埃政府约定,待得到不迫害逃亡难民的承诺后,将自愿回国者陆续遣回。拒绝回国的俄难民暂为收容或送往林场作工。“同时由朝鲜元山地方移至长春者又有一千数百人,浮居于头道沟南满铁路用地内。经向日领事交涉阻止,而来者仍源源不绝。复拟由中东路解送回俄,乃其中仅有一百四十人愿令送回,余皆坚不肯行,只可在当地设法安置”<sup>[3]</sup>。

除安置与遣送本地难民之外,东三省还承担了接待转运由南方与新疆转道回俄的溃兵难民,表1为东三省1920至1922年安置溃兵难民情形。

表1 1920-1922年东三省处置俄败兵难民大略情形一览表<sup>[4]</sup>

| 日期         | 地点        | 约计人数          | 类别    | 处置办法             |
|------------|-----------|---------------|-------|------------------|
| 1920.11.20 | 穆稜河       | 30余           | 败兵    | 解械遣送出境           |
| 1920.03    | 富锦        | 400余          | 败兵    | 解械安置             |
| 同上         | 饶河县       | 400余          | 败兵    | 解械安置             |
| 1920.3-12  | 海满各站      | 兵21000余,民500余 | 败兵、难民 | 酌给给养陆续经过绥芬遣送回国   |
| 1921.07.02 | 瑷琿、黑河、海拉尔 | 143           | 败兵    | 在黑龙江设收容所收容后遣送海参崴 |
| 1921.10    | 海拉尔       | 564           | 败兵    | 收购其军械马匹后遣送       |
| 1921.10.31 | 莫里勒克卡     | 45            | 败兵    | 解械安置给予费用并发放居住执照  |
| 1922.03    | 三间房、饶殷射佳河 | 近100          | 败兵    | 解械遣令出境           |
| 同上         | 哈尔滨       | 不详            | 难民    | 因人数量过众,设置工厂以资救济  |
| 1922.10    | 满站等处      | 10000余        | 败兵    | 解械安置             |
| 同上         | 绥芬        | 2000余         | 败兵    | 得苏维埃保证后遣回        |
| 同上         | 马桥河       | 200余          | 败兵    | 安置于亚布力林场         |
| 同上         | 安东        | 100余          | 败兵    | 送长春收容            |

资料来源:《函送历年处置俄难民情形报告请转达联合会》,1924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3-02-013。

1923年1月,外交部俄事委员会向劳农政府代表越飞(Adolf Abramovich Joffe)发送交涉声明,数月来俄国红白军在海滨省地方激战,溃军难民分窜邻近,中国东省沿边秩序备蒙损害,大量溃军持械入境后劫掠生事,给中国带来极大影响。中方向苏维埃政权告知当下白俄溃军处置情形,要求苏维埃

[1]《安置俄难民与妇孺及白党办法均规定于十条之中向两党登报宣布事》,1922年11月2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022-04-006。

[2]《中国历年处置俄败兵难民情形》,1924年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3-001。

[3]《函送历年处置俄难民情形报告请转达联合会》,1924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3-02-013。

[4]档案原件下有附注,本表仅据东三省陈报文电编制,其由各地地方随时处理,未经报部者为数尚多,无从列入合并声明。

驻哈尔滨办事机构承诺妥善引渡溃兵难民不能予以不公待遇,并声明中方保留向苏维埃政权索偿相关损失的权利<sup>[1]</sup>。随着战事的平息,东三省难民逐渐回国或南下上海等处,滞留东北的难民逐渐聚集于哈尔滨与中东路特别区。至1924年7月,中东路特别区内共有难民3072人。依靠公私团体组织在工厂于庇寒所工作者有1128人,完全依靠救济会发给免费面包者208人,自谋生路散居者1736人<sup>[2]</sup>。

### 三、上海难民问题及俄舰入沪交涉

作为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上海原本有若干俄国商人居住,由于其讯息发达且交通便捷,十月革命后的上海也成为俄国难民逃亡的目的地。1918年后难民抵沪愈聚愈多,给租界带来巨大压力。租界工部局为阻止无业难民来沪,向哈尔滨、海参崴等地发出数百张告示称:“外人到沪者已达千名以上,其中毫无可谋之职业之希望且无自立之财产者甚伙……凡无正式护照之难民非彼等到沪后有谋得职业之希望者一概不准进入。”<sup>[3]</sup>但俄国战乱频仍,难民流离失所,远东地区日、朝等国又坚拒其入境,因此由海路及陆路由东北、新疆各地赴沪者,仍络绎不绝。据《字林西报》载,至1919年11月底在沪俄国难民有2000余人,其中95%身无分文且不懂英语无法谋生,这些难民饥寒交迫亟待救助<sup>[4]</sup>。

租界当局对于难民的入境起初采取抵制态度,1920年春,俄国难民由东北与天津等地乘船南下,工部局与领事团知悉后如临大敌,要求对所有未带护照者,阻止登岸并加取缔,唯恐此种俄国难民入境<sup>[5]</sup>。反之中国当局却愿对俄难民施以援手,同年9月由南京转送俄国难民到沪,计男女幼童等共24人,外交部驻沪交涉员立即派员赴站接待并安排旅馆下榻<sup>[6]</sup>。上海的教堂也常派员赴车站接待难民,将其送往教堂安顿<sup>[7]</sup>。1921年10月,在上海正式登记的俄国难民有1000余人,多数由哈尔滨与海参崴赴沪,“大多住于虹口北河南路俄国善堂及礼拜堂内……男则做成衣、皮匠及各种工作,女则佣工,次者在北四川路、鸭绿路等处做下等娼妓,甚至有求乞度日者”<sup>[8]</sup>。

因为害怕被引渡遣返,藏匿于租界地区不愿注册的难民还有3500-4000人,这些难民中仅不足20%可以生活自立,绝大多数因为不懂中文与英文无法觅得工作。初由旧党海参崴政府领事负责对此项难民的安抚救助,随着俄国旧党政府的式微及中国取消其领事权利后,租界中俄国难民由慈善机构“俄国慈善会”负责。据长期担任沙俄驻沪总领事的格罗谢(V. F. Grosse)称:“俄国慈善会救助之俄人无宗教党派之别,入款乃会员费义务捐并他项之款,其定期音乐会及宴会均会中筹备或俄女士所备……俄慈善会已用去一六零五二元。”<sup>[9]</sup>慈善机构还组织难民学习英语并助其就业,另设立免费的简易旅馆和食店。“至海参崴政府失败后有从海道赴沪者前后约有万人之谱,均由地方官会同当地慈善

[1]《劳农代表姚斐通知本省白党溃军难民情形并声明向俄保留索偿一切用费之权由》,1923年1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022-04-017。

[2]《送特别区俄难民人数暨生活状况表》,1924年7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1-04-007。

[3]《工部局阻俄国难民来沪》,《新闻报》1918年5月8日,第9版。

[4]“Destitute Russians of Shanghai”, *North-China Daily News*, Nov.26, 1919, p.7.

[5]《俄国难民过境之函知》,《新闻报》1920年3月27日,第10版。

[6]《俄国难民由宁来沪》,《新闻报》1920年9月30日,第9版。

[7]《教堂安插俄国难民》,《新闻报》1921年1月28日,第10版。

[8]《呈复查明上海俄难民安置办法各情并抄送节略请鉴核》,1921年10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28。

[9]《俄难民在申节略》,1921年10月2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28。

机关随时募款救济”<sup>[1]</sup>。

海参崴政府溃败后,白党海军舰队司令史塔克(G. K. Stark)率领军民舰船共计15艘于1922年11月逃亡朝鲜与日本,日本当局仅允将难民中携带资财的青壮年留下,而拒绝船中孤寡老弱者的避难要求。流亡舰队无奈从釜山继续航行,于12月5日至9日陆续抵达上海。到沪的军舰有旗舰贝加尔号(Boikal)等9艘,其余为非武装船只,“载有俄国海陆军官眷属及难民约千六百人,并有小炮二十五尊,快枪二百余杆”<sup>[2]</sup>。除军人及其眷属外,还有大量战争遗孤随船抵沪。船中粮食将断,由中方官员与在驻沪领事团共同商议,命俄舰暂时停泊吴淞<sup>[3]</sup>。对于船中有亲友在沪可以投靠者,办理手续准许居住,“船中俄侨,有旅沪俄侨为姻亲者亦居少数……如无旅沪亲戚有人具结者,概不准登陆居住,如需购取食物等类,给以二十四小时内临时登陆执照”<sup>[4]</sup>。

俄舰抵沪立刻引起中外各国的高度重视,法国公使傅乐猷(Aimé Joseph de Fleuriau)约见中国外交部次长沈瑞麟。傅指出:“本公使之意拟提议将此问题送国际联合会办理,系由该联合会向苏维埃当局妥商送回俄国办法……为人道主义起见,似宜设法送回俄国以救此项难民生命。”<sup>[5]</sup>中方亦愿意以人道主义为宗旨,参与救助难民。但中方顾虑难民过多且军舰问题非常敏感,担忧因此挑起国际争端,也希望避免引起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误会。与此同时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J. Batalha de Freitas)会晤中国俄事委员会会长刘镜人,声明将力促中国与国联合作解决此次危机。刘镜人答复符礼德:

本部对此事正妥筹方法,此间劳农政府代表已两次来文请求将此项船只卸装扣留交其收受,并将所有穿上军官人等尽利拘捕。今日本部接上海报告称据该俄船上俄海军上将司塔克宣言,彼等现拟不驶入口岸,惟缺少粮食与煤共计值洋一万数千元,如能由万国红十字会发给此项粮食与煤或者由该会出名救济,则该船只即可离开华境驶往他处,而中国对于劳农方面可以免除接济白党之嫌。本部应付俄事为难,贵使谅能洞悉。<sup>[6]</sup>

中外各方都想极力促成危机化解,但一支拥有武装的舰队游弋上海,使中外各国都紧张异常。此时苏维埃政府也正式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扣留该舰队并交还,中方决定采取措施以免激化矛盾,北洋政府向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施令:“照日本办法,一概不准进口登岸。惟各船粮食缺乏似宜酌予以接济,以重人道,可由万国红十字会赶速集款救济。惟须向各该舰声明,粮食一经拨到,即行启旋他驶,并不准开往中国其他口岸。”<sup>[7]</sup>

据中外红十字会统计,14艘舰船共计1670余人,其中孩童374人,多为孤儿,“自彼得格勒、莫斯科、波罗的海滨及土耳其斯坦等处流徙四五年,辗转至海参崴者,史氏之意急欲使难民登岸并为孤儿谋一安身之所教养以至成人”<sup>[8]</sup>。初抵沪时俄舰中孩童多患病,但是当局担忧“如准病孩登岸,其妇女

[1]《函送历年处置俄难民情形报告请转达联合会》,1924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3-02-013。

[2]《俄舰来沪再纪》,《申报》1922年12月9日,第13版。

[3]《大队俄舰到淞》,《新闻报》1922年12月8日,第9版。

[4]《俄舰来沪之续报》,《新闻报》1922年12月10日,第9版。

[5]《俄难民来沪事》,1922年12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2-03-007。

[6]《俄旧党难民由海参崴乘轮来华商情设法救济事由》,1922年12月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2-03-007。

[7]《俄船来华经阁议接济粮食不准进口由》,1922年12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3-01-003。

[8]《俄舰抵淞五纪》,《申报》1922年12月12号,第13版。



必将援例请求。殊与政府决定之办法不符,当经拒绝所请。惟俄船如果确有病孩应立即商请红十字会迅派医员携药品上船诊治”<sup>[1]</sup>。目睹惨况后,中国官民皆认为孤儿困苦无依,转而准许其登陆妥善安置,其中一部分孤儿由美国红十字会负责送往美国抚养<sup>[2]</sup>,另一部分约200人于1923年初登陆,在新闻路与极司菲尔路由俄国赈济会照顾暂居,准备日后将其送往塞尔维亚求学<sup>[3]</sup>。

俄舰停泊吴淞适逢圣诞节,上海中外团体踊跃捐助煤炭、太古糖、山芋干、面粉、萝卜干等物资,并由中方与租界共同允许损坏的4艘俄舰进入江南船厂坞内修理。但华洋当局为避免争端提出三点要求,“一、不准承受俄舰抵押,二、不准承租俄舰,三、不准贪贱承买以免日后劳农政府之质问”<sup>[4]</sup>。至1923年1月初,通过中外各方的努力已将俄各舰煤炭、面粉等补给完成,俄舰向各慈善团体表达谢意后准备离港<sup>[5]</sup>。当月6日已有5艘舰只离沪欲前往西贡等地,余下各舰陆续开拔。至当月11日,除3艘舰船暂交由中国海军看管<sup>[6]</sup>,其余所有军舰驶离上海前往香港、马尼拉等处,“连日在沪有戚属友人担保及白俄孤儿等登陆者,约共有一千五百余人,散居沪地”<sup>[7]</sup>。

入沪俄舰由于生活困难,“驻淞俄舰中之侨民,有上岸私携炸弹军器等物来沪……兜售军火”<sup>[8]</sup>。零星军火流入帮派分子手中,对上海当地社会治安影响严重。更有甚者,中国南北军阀皆垂涎于俄舰的火炮装备,纷纷设法与俄舰联系购买。由于中国当时各派纷争,西方各国约定不能将军火售予中国,军阀仅能以私人名义少量订购,俄舰携带的军火使各方趋之若鹜,“吴佩孚藉南京方面之力捷足先登”<sup>[9]</sup>,将3艘滞留中国的舰船与军火购买运往南京。

首次俄舰入沪后,逃亡的白俄分子发现上海是极佳的避难所,为迅速出售军火换取经费,随后又有多次俄舰入沪。1922年12月13日,俄舰爱亚斯特堪(Astrakhan)及爱立万(Eriva)在烟台被中国当局扣留<sup>[10]</sup>,于次年春辗转抵沪,齐燮元等以俄舰拖欠中方经费为由,将两艘舰船收购并驶往南京<sup>[11]</sup>,苏维埃政府强烈抗议要求中方停止收购军火与舰船的行为,并归还俄舰<sup>[12]</sup>。1923年9月15日,蒙古街(Mongugai)、查是尼克(Gaitchinic)、阿霍次克(Orhotsk)三舰由沙俄前将领格列勃夫(Gliboff)率领抵沪,随舰而来的还有300余名难民,中国外交部要求“海关军警各机关设法禁阻进口……勒令该舰退回原泊地点”<sup>[13]</sup>,同时进行监视阻止其倒卖军火。另一艘俄舰爱尔多拉多号(Eldonado)在宁波、上海停

[1]《俄船如有病孩应商红十字会派医员上船诊治由》,1922年1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3-01-017。

[2]《淞口俄舰问题之昨讯》,《申报》1922年12月23日,第13版。

[3]《淞口俄舰消息种种》,《申报》1923年1月4日,第13版。

[4]《淞口俄舰之近讯》,《申报》1922年12月24日,第13版。

[5]《俄舰函谢慈善团》,《新闻报》1923年1月9日,第9版。

[6]《俄船事》,1923年1月11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3-02-010。

[7]《俄舰离沪之续闻》,《新闻报》1923年1月12日,第9版。

[8]《留淞俄舰近状》,《新闻报》1923年1月7日,第9版。

[9]《购买俄舰军火说之续闻》,《新闻报》1923年1月15日,第9版。

[10]《俄轮抵烟事》,1922年12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3-01-006。

[11]《俄舰亚斯特堪及爱立万两号因债务纠葛扣留在沪一案未据公廨呈取销禁令未便适准开行由》,1923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2-001。

[12]《俄舰亚斯特堪及爱立万两号俟未结各案取具妥保即可准其离沪由》,1923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2-004。

[13]《电陈遵将近日办理俄船蒙古街等三号情形乞鉴示遵由》,1923年10月2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2-13。

泊后销卖军械,“浙江地方官曾亲临购买并保护白军……又在吴淞口将所载之军械卖于一中国某军长”<sup>[1]</sup>。尽管苏俄代表一再抗议,要求将俄舰问题交由中俄双方会议讨论决定其归属<sup>[2]</sup>,但俄舰官兵不愿回国,遂与中国海军在吴淞江面形成对峙,图1为俄舰停泊与中国军舰监视位置情形。



图1 俄舰与中国海军僵持情形

资料来源:《俄舰事》,1924年8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4-010。

俄舰入沪问题僵持逾年仍难以解决,俄舰官兵曾决定售卖舰船或自沉,后又要求舰员轮班登岸养病。中国政府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何丰林要求海军永绩舰及两艘鱼雷艇扼守出海口以防止其潜逃,据查各舰共有“机关炮八尊,大炮一尊炮弹千余粒,枪械八百余支枪弹六百余粒,手枪十九支子弹八万余发”<sup>[3]</sup>。俄舰领袖曾希望以舰只16万元及军火4万元的价格向军阀售卖,中方慑于苏俄政府的警告始终不予购买,同时也惧怕尚拥有武装的俄舰强行出海,故保持时刻警惕。双方形成僵局近一年,6月间爱尔多拉多号曾出逃至崇明岛海域,后被中国海军拖回吴淞<sup>[4]</sup>。

1924年5月北洋政府与苏联建交,当年8月苏联派员赴华商定俄舰归国事宜,“中央政府向喀拉罕大使商议遣回方法,苏联政府对于前俄帝国在华财产要求交还”<sup>[5]</sup>,但对俄国难民却置之不顾,苏联的举动遭到俄舰难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拒绝俄舰回国。中方提议俄国难民回国经费由中苏两国共同承担,但喀拉罕认为中国政府应按照协定履行义务取缔一切白党活动,包括承担遣送俄舰难民的资金。中方只得提出以10万元经费遣散俄舰官兵难民<sup>[6]</sup>,终获多数难民的认可,俄舰陆续更换苏联旗帜航行回国,余下舰只并入万国商团参与护商,数百难民仍滞留中国,俄舰危机至1925年才彻底平息。

[1]《俄舰赴沪事》,1923年10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2-12。

[2]《处置来华俄舰事应归中俄会议解决》,1923年11月6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2-17。

[3]《俄舰事》,1924年8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4-010。

[4]《电复逃往崇明县属之俄船爱多拉号已拖驶回淞仍由军警监视行动由》,1924年7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4-002。

[5]《处置上海俄舰问题事》,1924年8月20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4-015。

[6]《遣散上海俄舰官兵需款数目由》,1924年9月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294-04-020。

#### 四、中国与国联合作救助难民及贡献

俄国难民向欧亚各国涌入成为国际问题,1921年国联决议组建安置俄国难民大会,“拟以邀集有关系各国会商救济办法”<sup>[1]</sup>。国联通过驻英公使顾维钧向中国发出邀请,鉴于“中俄边界收容俄人颇众,须筹划一办法”<sup>[2]</sup>,中国先后派出郑延禧、李世中等参会并表示愿意承担义务解决俄国难民问题<sup>[3]</sup>。国联于安置难民会议中提出四项问题要求中国调查清晰,“一、各省难民究有若干;二、各该难民如何生活有无工作;三、各地方是否有安置及善后办法;四、办理此项救济有何特别组织,每年用费约若干”<sup>[4]</sup>。中方迅速查明新疆、东北、上海、天津等地难民人数,安置情形等反馈国联,并公开阐明中方对于俄国溃兵难民的态度:

查中俄两国沿边接壤近若比邻,欧战以后俄乱频年,败兵难民逐相率窜入华境,由新疆经蒙古而达东三省。边区辽阔在在,为俄人阑入之途,维时中国对于新旧两党严守中立,而白军为新党所尾追携械分窜,所过肆扰难民襁负而至者络绎不绝,边陲骚动情势紧张。中国为维护主权及地方秩序计,增益沿边驻兵严为戒备,迭商赤军勿越境追击。一面令败兵缴出武装与难民等一并择地安置。流离琐尾,恒苦无以为生,衣食之需大率为地方有司所筹给。此固中国人本人道主义加以救济,初不问其党派之何属也,未几新党责有烦言,以为中国袒护旧党,屡请将逃军一律交还,中国始终毫无偏倚。<sup>[5]</sup>

关于各省涌入难民人数与救济办法前文已提及,在此不赘述,关于安置难民的经费问题,国联曾在安置难民大会中提出,“拟以各国欠前俄帝国款项移做救济经费涉及庚子赔款,其难民按照旧约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则由他一国代为保护”<sup>[6]</sup>。中方代表提出质疑,认为以慈善事业牵涉国际债务多有不妥,且庚子赔款正在展限期内,既然在华俄难民决议由中国照料,中国自可承担其所有费用。尽管当时中国财政极其艰难,但还是勇于承担救济难民的责任义务,除接受西方各国慈善团体部分捐助与暂用少量俄海参崴临时政府缴纳的金块外<sup>[7]</sup>,几乎完全凭借本国财政对难民施以援手。以甘肃省省长林锡光设法救助俄国溃兵难民为例:

甘省自去年办理资遣俄党后,由边境入关俄败兵及逃难俄人络绎不绝多则十余人,少则七八名,一入甘境沿途要求旅费车价。此辈流离转徙置之不理逗留日久集聚愈多穷极无聊,逞而走险,有碍地方治安,随时遣送则非酌给川资代雇车辆不可。省长公署毫无存款可资挹注,地方财政支绌万分尤难,设法刻流落省垣俄民三五成群来辕恳求资送……查救灾恤邻事关国际,若不另筹办法长此以往势必酿出事端,合无仰恳求大总统俯念边地困难情形,飭由

[1]《联合会拟安置俄难民事》,1921年7月14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01。

[2]《顾维钧电》,《新闻报》1921年7月23日,第7版。

[3]《难民会议已另派李世中前往》,1921年8月2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10。

[4]《处置俄难民情形仰即复查》,1921年8月2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11。

[5]《中国历年处置俄败兵难民情形》,1924年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3-001。

[6]《复敬电查俄难民事》,1921年8月28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1-014。

[7]《遣送俄难民案说帖》,1924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3-02-013。

花定盐税划项下拨留洋三万元交省署经收。凡沿途各县遇由接递俄败兵及逃难俄人准给予旅费车价, 取具领款人收据造具书单来署以凭照发。<sup>[1]</sup>

涌入新疆的难民由甘肃等地转道东北回国, 经过各省均需出资援助难民生活起居, 甘肃等贫瘠省份, 只得挪借盐税等财政经费以救济难民。中国政府承担在华难民的衣食住行全部费用, 并尽可能提供医疗服务, 使数十万难民基本生存得到保障。仅黑龙江一省, 至1923年底就为救助溃兵难民垫付大洋共计914700余元及16970金卢布<sup>[2]</sup>, 而东三省铁路截至1923年9月就减免62577卢布又68戈比车费, 还为溃军难民免费提供了价值20895卢布的服装<sup>[3]</sup>, 图2为全国铁路减免运输难民费用详情。

北洋政府还积极与国联合作制定《俄难民注册章程》及《俄难民通用护照条例》, 规定凡是住由俄难民的地区, 都应积极统计救助境内难民, “凡业经注册之难民如愿前往中国境内某地, 应呈由原住地方注册官厅核准, 在执照内著明, ‘某年、月、日前往某地’ 字样, 签证盖戳不再发给旅行护照……但出中国境前往他国者, 应遵照发给俄难民通行护照”<sup>[4]</sup>, 并且规定发给护照时只须不违反合法规定之事件, 对于穷乏之人得免其纳费。待中国与苏联建交之后, 又制定《俄难民请愿回国办法》, 其中规定“外交部接到前项请愿即据情通知驻京俄代表, 经苏俄政府保证入境后之安全, 由部令行原呈交涉署饬知该难民启程回国”<sup>[5]</sup>, 以充分保障难民的人身安全。

北洋政府接受国联的建议组建遣送俄难民临时委员会, 以中央有关机构人员及住有俄难民省份交涉员充任会员, 对于一切应办事项随时召集会议以期简捷而免隔阂。其调查各地俄难民情状及照料遣送等项, 由交涉员与各处地方官接洽办理<sup>[6]</sup>。国联派遣传教士高积善(James A. Greig)在华与中方合作救济遣送难民, 并制定出《难民遣送办法》。据高氏统计, 至1924年4月除新疆与西北各省俄难民人数未经查明外, “东三省、津、沪各地合计由四五万人, 自愿回俄者约百分之二”<sup>[7]</sup>。

北洋政府接受国联的建议组建遣送俄难民临时委员会, 以中央有关机构人员及住有俄难民省份交涉员充任会员, 对于一切应办事项随时召集会议以期简捷而免隔阂。其调查各地俄难民情状及照料遣送等项, 由交涉员与各处地方官接洽办理<sup>[6]</sup>。国联派遣传教士高积善(James A. Greig)在华与中方合作救济遣送难民, 并制定出《难民遣送办法》。据高氏统计, 至1924年4月除新疆与西北各省俄难民人数未经查明外, “东三省、津、沪各地合计由四五万人, 自愿回俄者约百分之二”<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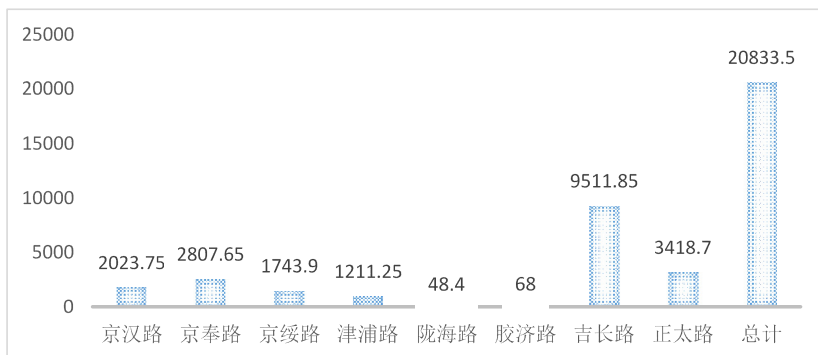


图2 截至1924年3月中方减免遣送难民铁路运输票价情况 单位:元

资料来源:《抄送各路垫付遣送俄难民费用及商民损失服装价款请查照由》, 1924年3月5日,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19-01-017。

[1]《可否划拨盐税救济来甘俄难民事》, 1922年12月29日,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029-01-012。

[2]《函送遣送俄难民垫付款项数目单请查照由》, 1923年12月27日,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18-02-022。

[3]《抄送各路垫付遣送俄难民费用及商民损失服装价款请查照由》, 1924年3月5日,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19-01-017。

[4]《中国历年处置俄败兵难民情形》, 1924年2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52-03-001。

[5]《函送历年处置俄难民情形报告请转达联合会》, 1924年6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53-02-013。

[6]《遣送俄难民案说帖》, 1924年6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53-02-013。

[7]《遣送俄国难民办法》, 1924年4月,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档案号:03-32-453-02-013。

由于中国本身的贫弱,在华难民处境的确堪忧,据高积善呈于国联俄国难民问题专员南森博士(Fridtjof Wedel-Jarlsberg Nansen)的报告中指出:“难民生活情形极为可怜,大多缺乏衣服无钱使用全仗慈善捐助或极不可靠之雇佣为生。所居房屋及贴身衣裤均非常污秽,在大地方始有医药援助……人数拥挤为公共卫生之害”<sup>[1]</sup>。故而高积善与中方皆认为以遣送难民回国或前往第三国诸如美国、加拿大等处安置为最佳。在中国与国联的不努力下,美国于1924年6月表示愿意接受俄国难民赴美<sup>[2]</sup>,随着中苏建交局势平定,当年底大批难民开始归国<sup>[3]</sup>。据中国当局统计,“其历年自愿回国由边省遣送出境者,约计三十余万人,不独供亿频繁,即当事者之措置随宜,实已劳于臂划”<sup>[4]</sup>。

## 结 论

俄国难民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衍生问题,沙皇俄国的崩溃与苏联的兴起改变了世界格局,国联成员欧亚各国相互合作解决救助难民问题,在近代史上也是首开先河之举。当时中华民国成立不过数年,尽管国力贫弱,仍旧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竭力拯救难民。1918至1924年间,中国各派纷争不断,政局动荡,乃至没有一位正式国家元首。但北洋政府仍旧尽力救助俄国难民,既没有同意减免俄国的庚子赔款金额,也没有得到苏维埃政府偿付遣送与安置费用,还拒绝西方国家让中国出兵俄国远东干涉俄国革命的要求,仅凭借各省垫付经费救助难民,保持中立与人道主义,可谓宅心仁厚。

对俄国溃兵及难民的救助,是中国跻身于国际外交舞台的重要表现,与清王朝被迫卷入国际争端不同,北洋政府的外交斡旋与积极表现是近代中国真正履行国际义务与维护区域和平的重要象征。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评价1912年时沙俄政府以武力胁迫要求中国撤出蒙、疆等地驻军及放弃治权的行径:“二十世纪竟还有这样明目张胆的恫吓敲诈行为,向中国提出这样种要求真是荒谬绝伦,我说其实这就是大多数帝国主义强国现时在亚洲奉行的政策……我们是个弱国,处理外交事务确实困难,唯一的办法就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谈判中在原则问题上不屈服”<sup>[5]</sup>。数年后曾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国覆灭,而数十万难民涌入时,中国又以其广博胸襟庇护难民化解危机,相比日、英等国闭门拒绝难民入境,正是这样一个弱国敞开怀抱扶危救难,此种人道主义精神堪称国际典范。

[责任编辑:道 成]

[1]《函送致南森博士报告书》,1924年2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2-02-019。

[2]《俄难民预备赴美》,《新闻报》1924年6月12日,第14版。

[3]《俄难民大批归国》,《新闻报》1924年11月7日,第9版。

[4]《函送历年处置俄难民情形报告请转达联合会》,1924年6月,[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藏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档案号:03-32-453-02-013。

[5]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6页。